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严中平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严中平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中平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978-7-5004-9304-4

I. ①严… II. ①中… III. ①严中平(1909—1991) —文集
②经济史—中国—文集 IV. ①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7855 号

责任编辑 周兴泉

责任校对 刘晓红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7.25 插 页 4

字 数 434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序 言

我在严老领导主持之下，工作了整整四十年。他治学的严谨，是有口皆碑的，我自己也有切身的感受。但我认为这里面最可宝贵的精华，是他对真理探讨的执著追求。他是一位坚持理论原则、执著追求真理的典范。他所坚持的理论原则，就是唯一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毕生研究实践使他越来越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好的史学方法，因此，对自己确认的原则，从来不轻易放弃。他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的确具有这一鲜明的特点。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当他认定自己的看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时，他对这个看法的坚持，可以达到不作任何让步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屡屡看到他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当他在理论原则指导之下，对问题的研究获得新的启示时，他又勇于进行自我修订，不断自我更新对问题的认识。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问题上，在洋务运动和闭关政策评价的问题上，都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坚持理论原则，执著追求真理，他才勇于在理论原则的指导下，不断更新认识，不断自我修订。正如他在一篇对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体会中所说：“科学的治学态度”，是

“既要坚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又要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根据新材料，总结出新的结论”。他以此教育青年，自己也身体力行，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执著追求真理，贯穿于严老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战斗的一生。

不断自我修订，这是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人类只能认识到问题的无限，即不能结束无限的问题。在真理的历史长卷中，会出现无限无穷的“问号”，但永远也不会出现一个“Full Stop”。在严老那里，“Full Stop”也是不存在的。而他勇于提出“问号”的精神，则给我们以无穷启迪的智慧，增加我们向前探索的力量。

《严中平集》的出版，不但使严老这一中国经济史学奠基人的全部学术遗产，得以完整保存，并贡献于社会，传诸后世，而且也使得严老毕生的学术道路、研究历程、治学态度和科学贡献，都给后人留下了清晰的印象。这是很值得纪念的。

汪敬虞

1992年1月严老逝世周年前3日稿，

2010年5月修改

目 录

序言	汪敬虞 (1)
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	(1)
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37)
努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	(45)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	(52)
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	(57)
论江宁条约与中外通商	(69)
“浮动地狱”里的滔天罪行	(121)
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 英美“领事”和“商人”	(133)
马克思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朋友 ——纪念马克思逝世七十周年	(147)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56)
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	(222)

小刀会上海起义新史料	(334)
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宁波攻守纪实	(343)
戈登论李鸿章苏州杀降动机书并跋	(356)
1861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	(363)
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	(383)
手工棉纺织业问题	(413)
规律性判断研究和价值性研究	
——关于历史评价的问题的构思	(446)
关于哥伦布其人答朱寰同志	(462)
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历史评价问题还需要讨论	(485)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通讯	(498)
关于洋务派兴办新式民用企业的评价问题	(509)
作者论著目录	(527)
编后琐言	(531)

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 工作的初步总结

1954年初，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了一个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小组，接受上级领导所交付的任务，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今年^①4月，这个小组把计划进行的工作初步告一段落。为了改进今后的工作，小组同志们曾经进行过几次座谈，交流经验。两年的经验，当然是极其粗浅的、片面的、幼稚的。如今我们把它写下来，以便向先进的科学工作者们请教。

一 思想准备

我们小组的任务是：尽量利用原始资料，为科学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和中上级财经干部系统地编纂近百年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史的参考资料。在开始工作时，小组计有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6人、研究实习员2人和助理业务的

^① 1956年。

翻译、计算人员 5 人。工作过程中，人员有一些变动，最后经过 7 个研究人员的手编成了农业、工业、手工业、对外贸易、货币信贷这几个部门的断代史资料约 450 万字。我们肯定这些参考资料，对于各该部门某一断代的历史发展情况，或多或少地都提供了一些感性知识。但是全面说来，我们所编纂的资料是极其粗浅片面的，真是所谓“挂一漏万”。现在我们这样想：如果两年前开始工作时，我们各人都已做好了思想准备，那么我们的工作是会做得比较好些的。

我们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就是对于完成任务的信心不足和对于工作的严肃性估计不足。

我们 7 个至 12 个研究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已有了 5 年以上的研究工作经验；但我们这些人过去做研究工作的领域包括经济理论、现实经济问题、明清史、近代史、外交史等方面，惟独没有长期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我们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工作，多少都是一项所谓“改行”的工作。因此，在开始工作时，我们对于自己能否完成这项新的任务，能否找到资料，编出有用的东西来，自己是没有把握的。有人说，清代学者把精力耗费在训诂校勘之学上，不注意人民生计，怎么能从他们的著作里找出农工各业的史料来呢？又有人说，过去人们根本没有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辛亥以后的史料一样地没有办法。最普遍的想法是：经济史素非本行，不知如何下手。这样，大家多半是抱着一种“姑且试试看”的心情下手工作的。

事实上，在工作过程中，我们逐步地打开了眼界，逐步地认识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资料蕴藏极其丰富，真是令人应接不暇。因此，我们的信心提高了，多数同志由“姑且试试看”变得满怀信心地热爱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时期，我们不是做 8 小时工

作，而是进行 10 小时乃至 10 小时以上的紧张劳动，但是我们的劳动有收获，因而我们也就感到这种疲劳特具一种令人兴奋的滋味。

根据这些经历，我们认为在研究工作上，像我们这样的小改行并没有多大的困难，疑虑顾忌，完全是不必要的。其实毛主席早在 1937 年就已经在《实践论》里指出了我们这一类的心情，在主观上，乃是“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的表现，在客观上，则是不了解工作规律的现象。问题丝毫并不在于我们过去曾否长期地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而在于我们是否肯于虚心地从工作中学习。对工作的信心不足，其实正由于对自己的信心太强，懒于学习而来的。

其次，过去我们这些人习惯于自己收集资料，自己分析研究，自己撰写专题论著。当上级领导规定我们的任务是系统地收集、整理、编纂资料以供别人参考利用的时候，我们那一套旧的习惯和想法，多少和我们的任务是有些距离的。我们念念不忘于旧的那一行，轻视新的这一行，认为资料工作不是研究工作人员的任务，而是助理人员的任务，是“下手活”，是“为人作嫁”的行当。在工作中，我们才慢慢发现这项“下手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它是需要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业务知识才能胜任的。另一方面，一年多以来，我们所收集的资料，不断地进入国家行政部门，在那里成为规划祖国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参考资料；又不断地进入高等院校，在那里成为广大青年的精神食粮。这使我们逐渐觉悟到我们所负担的不仅是一项艰苦的、而且是一项严肃的任务。这并不是“下手活”，每个人都应该甘于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培植下一代而这样去“为人作嫁”。

最近，我们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号召，明确了我们

们的任务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把我们这门科学提高得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可是当我们考虑远景规划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我们这门科学的基础十分薄弱，科学的发展规律正要求我们在当前这个阶段，大力展开资料工作，为我们这门科学的昌盛打好基础。我们这些人做了五六年乃至 20 年的研究工作，到今天才在周总理的号召和党的领导之下第一次打开眼界，从科学发展的规律来考虑问题，规划全国的和个人的 12 年工作，明确我们个人当前这份工作在中国这门科学发展过程上的意义和作用；于是我们就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们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我们深以负担这样的奠基任务而感到光荣。

我们知道，有些青年抱着和我们两年前相类似的想法，轻视资料工作，等待别人从事辛勤的劳动，把资料收集好了，然后自己则利用这种成果来进行分析研究工作，写论文专著，自成一家之言。我们现在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看法不仅不从整个的科学发展作打算，并且也忽略了资料工作对于培养青年科学研究能力的巨大作用。就科学的发展规律而言，我们难以想象脱离史料去提高史学；就个人研究工作而言，我们也还没有见过不收集史料的史学家。坐享其成的打算，多半是要落空的。

在我们工作中，由于我们对于资料工作的严肃性估计不足，因而我们对于这项工作的艰苦性也就估计不足。例如最初我们计划以三个人的力量，一年半的时间，编出近百年农业史资料约 60 万字；实际我们的工作速度比预期的慢一倍，编成的资料分量比预期的大两倍以上。我们的计划订得过于冒进了。由于计划冒进，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们出现赶任务的错误做法。那时，我们有的同志忙于赶任务，所以接触资料并不仔细寻思，只是走马看花地浏览一过，结果，常把有用的资料遗漏了，需要返工。走

马看花的工作态度当然就是不严肃的态度。如今我们深深认识到，工作态度不够严肃，工作中每日每时、每一个步骤，每一条资料都可能发生错误。即使是抄写计算这样简单的工作，也必须严肃对待，勤于校对，往往一字之差，就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既然我们的成果通过国家行政部门成为规划祖国建设的参考资料，通过教师成为年轻一代的精神食粮，那么我们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错误缩减至最小限度，乃至消灭一切错误。去年我们印过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这本书的三次清样都是经过我们自己校对过的；可是一边校对，一边修改，而校对也不够认真，所以到全书印成以后，又不得不追加一幅很长的勘误表。这说明我们对待这本书的态度是多么不够严肃，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附带地还应该说明一件事实。过去两年，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受到平均主义思想作风的严重损害。原来全组 12 个研究工作人员共进行 10 个专题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编辑工作，自研究员以至研究实习员，不论有无工作经验，几乎人手一题，平均分配。就是有两个人合作一个专题的，这两个人也各自独立进行工作，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事实证明，没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同志是不宜于独立进行这样的工作的，勉强独立，成品的质量是很低的。如果是两个或是更多的人合作一个专题，分工是必要的，但分工不等于闹独立；科学工作必须发挥自由思想，但这也并不等于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怎样进行必要的分工，以便发挥各人的专长，同时却又相互协调，充分合作，这不仅仅是一个组织问题，也是一个思想问题，是耐心的学习过程，锻炼过程。对于一些具有研究工作经验的年长的人，这样的思想准备可能比年轻人更加必要些。

二 工作提纲

我们小组一致同意工作提纲是必要的。提纲规定自己的工作范围，提出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类乎一本书的章节标题。这样的提纲对于自己的工作起着指导作用，在思想路线上、在工作进程上，以及在估计资料分量、规划收集资料的步骤上都有指导意义。尤其当有人合作进行，而合作人又缺乏经验时，为了明确需要什么资料处理什么问题，更是非拟出提纲不可。经验证明，这样的提纲绝不是匆促可以定好的，也不是一次可以定好的。

我们曾经有人企图在下手工作时就拟定系统完整的详细提纲，花费了很多的劳力，定出章节细目，力求其完整严密。结果，这样的提纲确实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它却是从概念出发的，不切实际的。到了按照提纲去收集资料时，才发现提纲上规定需要的资料，实际未必有；大量有用的资料，却又不在收集范围之内；到最后，还是不得不抛弃了这个提纲。同时，提纲又是不可避免地需要修改的。因为当人们进一步深入资料的时候，对于自己所处理的问题也就获得了进一步的理解，形成自己进一步的看法，跟着对于资料也就有了新的要求，这时，自然没有必要拿既定的提纲来束缚自己的思想与工作，而修改提纲却是必要的了。

最初一次提纲，应该只是一个很粗的轮廓。但是做好这个轮廓，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工作人员，可能已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对于当前所要处理的问题还是未必很熟悉的，只凭一般常识性的了解并不能解决当前的具体问题。因此，经验证明，我们并不能在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就执笔拟提纲，而是要经过一个阶段的摸索然后才能下笔的。这种摸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问题

摸底，一是资料摸底。

对自己所处理的问题进行摸底，目的是要大体明确贯穿在本问题中的指导思想，前人研究本问题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和自己处理本问题所企望达到的广度与深度这三个问题。

提纲对工作起着指导作用，因而它本身也就必须贯穿着某种指导思想。这样的指导思想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和党的政策文件为依据。因此拟定提纲的第一步就是学习这些文件。指导思想一经确定。就应该彻底贯穿到整个工作中去，不该轻易更改。因为全部工作中，一切问题的提法，收集资料的重点，都是围绕指导思想设计的；指导思想的更动，势必打乱全部工作，难以收拾。

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仅仅明确指导思想，当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很好地掌握问题所应该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盲目性。而为了对问题的广度与深度掌握得恰到好处，仅仅学习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文献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批判地审阅前人的研究成果，明确他们的错误所在和他们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在这一点上，我们小组也曾经发生过偏差。

我们小组本抄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期刊论文索引卡片，但在工作中却很少有人去加以利用。大家觉得这批索引大都收的是旧中国期刊上的论文，它们的立场是不正确的，所以没有参考的价值。这种全面否定前人成果的想法不独忽略了解放前党所领导的刊物和进步作家的贡献，就是对当时资产阶级作者的作品，也是不正确的。不该忘记，马克思是在批判地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前进的。没有错误的东西，也就没有正确的东西。在历史事实的研究方面，我们尤其不该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须知列宁一面斥责那些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在

一般理论上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有学问的奴仆，同时也肯定他们“在事实的专门研究内能够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①。谁要是费很大力气去考订前人已经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岂不是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么？事实是，如果我们不愿接受前人正确的研究成果，明确前人所已经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将不知从何做起，无从掌握自己工作所应该达到的广度与深度，甚至不认识自己问题的关键所在，以致轻重倒置；这样，我们有时就会走上很可笑的道路。

我们小组开始工作时，定下一个各专题共同遵守的统一的原理，就是“用主要的资料说明主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空洞无物非常可笑的规定。根据这样规定去进行工作，结果各人处理问题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很不一致，并且快到完稿时，提纲还有所更动。例如原来计划另编一本中国工人阶级史资料，所以在工业史资料的提纲里就没有把这方面的问题放在考虑之内。最后我们又感觉一本工业史资料不应该忽略这一重要方面，所以完稿后又加补充，这自然是很费时间的做法。这是对于处理问题的广度没有考虑成熟就定下提纲所造成的错误。又如，最初我们规划清代农业史资料土地问题部分时，我们只规划到地权分配和土地利用方面的一些问题；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与形式也是我们应该处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是工作已接近尾声，这个问题的资料已经难以追补了。这又是我们对于处理问题的深度没有考虑成熟就定下提纲所造成的损失。固然，处理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难以在第一次提纲里就作最后确定的，但像我们所说的这些重大问题却是不该忽略的。在提纲上忽略了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在拟定提纲时没有做好对问题进行摸底的工作。

另一方面，过去两年，我们小组几乎可以说是在无计划的状

①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3页。